

探究中国哲学 溯源华夏心智

——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管窥

刘亚丁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985 工程”南亚及当代国际问题研究创新基地,
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成都 610064)

提 要: 新世纪以来,域外出版了若干种中国哲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其中俄罗斯科学院版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是非常有特色的。该书突破了原来苏联哲学研究模式,在内容丰富等方面引人注目,其对中国精神文化的逻辑性归纳,某些词条考镜源流式的学术探究,可为国内学人提供参照。《哲学卷》注重儒家而疏略道佛的偏向也无须讳言。

关 键 词: 哲学卷;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俄罗斯汉学;丰富性;参照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3)04-0137-03

新世纪以降,西方学界中国哲学的研究依然有不少新著述问世。若以工具书来看,则有安东尼奥·S·考(Antonio S. Cua)主编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该书1千页有余,由77名世界各国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撰写187个词条。该书的词条都很长,定位大概是介乎工具书词条与学术性研究之间。词条以人物为主,兼及重要的概念,如“气”、“心”、“情”、“格物致知”、“理一分殊”,更有对中国哲学分门别类的梳理,如“艺术哲学”、如“历史哲学”等^[1]。再如由布赖恩·卡尔和英迪拉·马哈林干主编的《亚洲哲学百科全书》。该书深入描述、阐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和伊斯兰哲学等亚洲若干国家的哲学,还为佛教哲学立了专章。两位主编为中国哲学写的导言指出“中国哲学具有漫长、复杂的历史。在封建的先秦时代(公元前200年以前),一些杰出的智者确实成了佛教从印度传来之前主要的哲学思想流派的奠基石,这些流派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2]该书分别由成中英、黄楠森、傅伟勋、黎惠伦(Whalen Lai)、阿里夫·德里克等撰写了“中国哲学的起源”、“孔子与儒家”、“中国哲学中的道教”、“中国哲学中的佛教”;“毛泽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中的逻辑与语言”、“中国哲学中的知与行”、“中国哲学中的道德与社会”和“现代中国哲学”等文章。其定位更偏重于学术性和研究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版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同样值得认真关注。

在中俄互办国家年期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于2006年推出了六卷本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的第一卷《哲学卷》,该书由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大典》由俄中友协主席、科学院远东所所长M·季塔连科院士主编,A·科勃泽夫和A·卢基扬诺夫副主编。2010年《大典》已经出齐了《哲学卷》《神话·宗教卷》《文学·语言与文字卷》《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科学·技术·军事思想·卫生·教育卷》和《艺术卷》。2012年我本人代表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签署了《大典》的中文翻译合同。同年我作为首席专家,会同国内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家们,成功竞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目前我们已开始了翻译工作。同英语世界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相比,我以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以下简称《哲学卷》)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3]价值突出,特点分明。

俄苏的中国哲学研究,曾经受制于前苏联的哲学研究模式。苏联哲学史研究模式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分法基础上的。1930年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书为苏联哲学体系提供了“雏形”,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苏联哲学“定了型”^[4]。苏联的学者几乎众口一词,以所谓反映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来解释欧洲的,甚至各国的哲学史。如苏联科学院版的《哲学史》的导言写道“自从哲学上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以来,它们之间就经常进行着斗争。这斗争归根到底反映出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科学的哲学史的对象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上的哲学思想发展史,首先是哲学的基本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它它们之间斗争的历史。”^[5]这不仅是导言中的两处表述,而且成了该书的主线。这种模式也体现在苏联的中国哲学史叙述中。第二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1卷(1953年)的中国哲学条目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哲学发展史,如同欧洲哲学发展史一样,是反映中国历史各阶段意识形态斗争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6]显然这几乎就是对哲学史上上述表述的复述。华裔苏联哲学家杨兴顺(Ян Хиншун),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的标题是《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7]。前苏联解体前后这种苏联哲学研究模式逐渐式微。

《大典》的《哲学卷》完全摆脱了前苏联哲学史的这种研究模式的限制,尤其是突破了唯物、唯心的简单二分法,突破了哲学发展史是对阶级斗争的反映等框框,竭力揭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内在特点。在《哲学卷》总论部分的“中国哲学和精神文化”中,作者强调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而且将它同欧洲文化、哲学相比较,以此来突出中国哲学的特征。“在欧洲的超验的、超理性的世界观中,柏拉图的哲学、基督教的神学、或者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世界在其理想状态的超验的强化。对于感觉主义的、理性的中国自然主义而言,世界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在它之中一切都是内在的,甚至包括它的精致的神性本质在内,完全没有任何超验的成分”(44页)。《哲学卷》的作者还着力揭示中国哲学内在的特征,认为中国哲学

方法论的特征在于以从占卜中发展起来的“象数学”逻辑来破解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秘密,如两分法——阴与阳,三分法——天、地、人,五分法——五行,等等(48—50页)。从对下面的梳理中,也不难看出《哲学卷》对苏联哲学研究模式的突破,对中国哲学的新阐释。

二

《哲学卷》在归纳和研究中国哲学和精神文化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方面下了功夫。其作者考察了中国和西方出版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主要范畴和概念简释》《中国哲学范畴史》和《Basic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cepts》等著作,从七个方面拟出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一、方法论:上、下、本、末、内、外、正、反、方、圆、同、异、经、纬、权、势、象、卦、矛、盾等。二、本体论:道、德、太极、无极、有、无、自然、使然、宇、宙、天、地、人、理、欲、机、器、阴、阳、体、用等。三、“生物学”和人本学:形、神、身、物、生、死等。四、文化学:文、武、质、朴、世、俗、公、私、艺、术、治、乱。五、认识论和效能学:感、应、知、行、言、说、意、诚、史、记、名、实、虚等。六、伦理学和美学:善、美、恶、仁、礼、义、忠、恕等。(七)社会学:圣、愚、王、霸、君子、小人、士、民、国、家(第74页—76页)。《哲学卷》的作者认为,确立这些概念和范畴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既可以从人类概念的共同性的推断出发,借助先验描述,或认为它们是客体(亚里士多德式的客体),或认为它们是主体(康德式的主体)。还可以像施宾格勒那样,竭力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尤其是从哲学中去寻找不同于欧洲的,甚至是与欧洲对立的因素(第76页)。

一些词条的作者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宏阔的学术视野,其词条写作几乎达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水准,如“三才”。作者认为在《周易》的注释中出现了三才的概念,在《系辞·传下》十章出现了这三者间关系的推理方式“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在《说卦传》中,与天道相联系的是宇宙力量“阴”——“阳”,与地道相联系的是阴阳在事物中的表现“柔”——“刚”,与人道相联系的是“仁”——“义”。将由天地诞生的第三方——人引入这个三位一体会产生如下作用:第一,这揭示了人在两大自然存在之间的居间作用;第二,通过实现这种非本体学的伦理原则走向调整宇宙联系之路。这些思想所产生的古代哲人国王作用的观念——“王”可以充当天地之间的调停者。解决天人功能关系的基本倾向在一系列公式中得到了表达“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天人之分”。然后《大典》作者将天人关系放在中国各家思想中来加以考察。“天人合一”观念是由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创立者董仲舒提出来的(见其《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个命题是对包含在先前的哲学典籍中的思想的发挥。在对《周易》的注释中确定“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文言传》一),这表明先在的现实性,即“先天”中大人不会对天造成阻碍,在“后天”,即现象世界中,大人“奉天时”,也就是说他要遵循宇宙循环的规律。《中庸》主张,为“能尽其性”者创造“参天地之化育”的可能性。孟子在发挥这个思想的时候提出“尽其心”,也就是说极大地发挥人的天性中善良的、智性的、情感的和道德的潜力,这是认识自然——“天”的途径(《孟子·尽心上》),发挥人的天性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然后作者将人与天地的关系放在先秦的道家、杂家等各派中来加以考察,如《庄子》《吕氏春秋》《左传》等等,着重讨论天人关系。复次,《大典》的作者又把三才,尤其是

天人关系放在宋明理学(在《哲学卷》通常称之为“道学”——нео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引者注)中来考察,分别论述,张载、二程、王夫之在继承《中庸》和《孟子》的基础上,对“天人合一”提出的新见解,如张载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提出的儒者之真。关于“天人之分”的命题是由荀况提出来的,荀况的基本论据是“天有常道”,即是说,天文和自然的循环是与人无关的,社会的灾难是由人自身引起的(《荀子·王志》)。本文作者按《大典》作者所引不确,荀子主要是在《天命篇》中表达这样的观点的)。其后,柳宗元表达了更激进的观点:天和人是两种对立的因素,各自具有不同的“能”(第378—382页)。足见作者对“三才”的考察是深入细致的。再如“格物”条,也可见出沿波讨源的功夫:格物是儒学四书之一的《大学》的八种实践认识论原理之一,在《礼记》中,将它与第一原理“致知”相联系。古代的注家郑玄将“格”解释为“来”,将“物”解释为事,即揭示对所有客观现象的正确知识。由于《大学》在新儒学中取得了特殊地位,成为四书中的第一本书,“格物”获得了尤为重要的意义。程颐借助于《周易》的文本,将它解释为“穷理”。朱熹将这一注释加以发挥,并使之经典化。他应用辞典《尔雅》将“格”解释为“至”,将“格物”与“穷至事物”之“理”作等量观。王阳明建议将“格”理解为“正”,就是说要正确理解“物”,他将这一过程称为“事”,也就是归结为“心身”,认为它还会发展为“修身”。在从17世纪开始的反思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潮中,“格物”被解释成对事物的实践关系,比如颜元认为是“手格其物”。到了19世纪末,“格物”用来指称西方的自然科学,在现代语言中它具有“自然科学”的意义(第216页—217页)。还有“《大学》”、“五行”、“仁”、“性”等许多词条都达到了这样的水准。

总体来看,《哲学卷》的定位是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绪论部分的研究文章、一些词条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很多词条则以客观地描述史料为目的,属于典型的工具书词条。

三

在文化交往对话日趋频繁的今天,一种民族文化,不但有该文化创造者承载者自己的自我体认,也需要他民族研究家的认知。这种体认和认知之间,既会有客观的、科学的理解和沟通,又必然会有文化误读,甚至有曲解,然而误读也有其价值。认真研究俄罗斯汉学界的《哲学卷》,其意义可略举三项。第一,重视俄罗斯汉学。我们过去注意日本、欧洲和北美汉学界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把它们看成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特殊角度。现在俄罗斯的《哲学卷》已经对中国哲学及其重要人物和典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再来研究自己的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时候,不能对之视而不见,否则难免“学术视野不够开阔”之讥。同时它也可起到破除汉学研究中话语权单一现象的作用。实际上俄罗斯汉学一直是汉学重镇,只是我们不太留意而已。如今一本大书推出,我们聆其洪亮音声,睹其曼妙手笔,还会继续漠然置之?第二,关注他者的眼光。中国古典文化中大量我们习焉不察、尚未被我们激活的精神资源,却被域外的研究者独具只眼挖掘出来了,透过他者的视角,通过《哲学卷》的大量的学理性研究,我们收获良多。比如“大同”,《哲学卷》的作者仔细爬梳“大同”在《墨子》《尚书》《列子》《惠施·农家》《礼记》《公羊传》《孟子》《国语》《吕氏春秋》等先秦著作中的表述;其后作者发掘“大同”经《太平经》和朱熹传的传承;作者还梳理近现代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吴稚晖、毛泽东的“大同”思想,指出郭沫若、吴虞、梁漱溟、蔡尚思、冯友兰、刘师培等对“大同”思想的阐发;作者甚至

还钩稽了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对“大同”口号的运用,这几乎就是一篇中国乌托邦思想史略(第242页—245页)。这也难怪,词条的作者本人就参与了专著《中国社会乌托邦》的写作。再如“礼”(第297页—299页)、“功夫”(第212页)等,都是如此。第三,刺激对话的机缘。《哲学卷》钩稽中国哲学中的元命题,并且力图将它们同世界其他文明和俄罗斯人的类似命题进行比较,如将中国的“道”与俄罗斯的“Глагол”和印度的“奥义”的比较(31页)。在这里,《哲学卷》又给了我们学术研究的鞭策和激励,跨文化的对话应该是双向的,我们在受惠于俄罗斯汉学界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该对俄罗斯的哲学和精神文化做出我们自己的研究,提出我们自己的见地,为两大民族的互相理解和沟通,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

《哲学卷》巨大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本人在阅读之中学得许多新知,真正是受益匪浅。但在阅读之中也不免略生谏议,在这里坦露出来,就教于《哲学卷》的作者和方家。首先,中国精神文化的大格局的认知问题。苏联时代的大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希望苏联汉学研究中国文化要儒释道三者并重。他在1940年写的《东方学所成员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报告》中写道:(苏联汉学家中的“哲学家应该担负起厘清中国哲学思想史(比如儒家、道家和佛家体系)的任务。”^[8]他自己就身体力行,1940年代中期,渐近晚年的他在《我是如何研究中国》一文中,对自己的学术工作做了这样的总结“因此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是相当广泛的。但是我没有分散精力,尽力集中在研究中国文化和它的古典基础——儒家、道家和佛家(略少一点)上。”^[9]对儒家,我们知道阿列克谢耶夫翻译了《论语》的一部分,翻译研究苏洵《论六书》,对佛家,他写了《中国文化和宗教中的佛教和基督教》《中国艺术文学中的佛教及其敌人》等著述,对道家他也有深入研究。《哲学卷》在对中国文化的大格局的认识上似乎不同于阿列克谢耶夫,也不同于中国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儒释道互摄互融为中国文化(包括哲学)主流的观点。在《哲学卷》的绪论中,作者写道“佛教在公元一世纪从印度传入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土壤上佛教经过了剧烈的变形,吸收了民间信仰、道教和儒学的许多重要因素”(第17页),然后就转向了佛教在日本等国的传播,没有将佛学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来谈。只是在“佛教”条目的文字中才谈到“在大众的意识中,至少在公元一世纪初佛教与儒教、道教一起成了‘三教’的组成部分,其哲学命题的某些部分渗入到了中国各种思想中”(第158页)。但在总论中完全没有此类表述。在谈及中国哲学和精神文化的基本流派时,《哲学卷》列举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定的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又说,班固《汉书·艺文志》在此六家之外增加了四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然后略为提及了《隋书》中的十四家之说。《哲学卷》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和精神文化的基本流派。然后就转而谈儒家的主干地位(第50页—53页)。这样写固然将中国哲学的源讲清楚了,但是,道家和佛家在中国哲学中的独特作用不谈,儒释道三者的互动关系不讲,中国哲学的流派反而显得模糊了。比如在谈“道学”(即宋明理学)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涉及到佛教中国化对它的影响(第368页—369页)。其次,与此相联系,在条目的取舍上也似有可商榷之处。一方面,先秦各家齐备,具体到儒家而言,则源流清晰,其后对宋明理学诸家也多有瞩目,可谓深中肯綮。另一方面,道家和佛家虽然最主要的内容都有,但与儒学相比就显得有些单薄。道家方面,内丹派、符篆派、陆修静、孙思邈、

成玄英、《云笈七签》《太上感应篇》等都没有列条目。佛家方面,没有《弘明集》《广弘明集》《高僧传》等条目,《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不但没有列条目,连在“禅宗”的词条的文本中都没有提到(禅宗里只有《六祖坛经》《临济录》列为词条);没有“佛性”、“格义”等中国佛教教理方面的词条;也没有提到宗喀巴等藏传佛教人物。因此同儒学相比,《哲学卷》道家和佛家词条的设置似嫌不够完整周备。结合《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第二卷《神话·宗教卷》的词条和研究文章来看,同样也有类似偏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俄罗斯汉学研究的状况,其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儒,不在佛道。当然,非中国的学人编撰中国哲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往往也有注重儒家而疏略道佛的偏向。如前述的安东尼奥·S·考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也是儒家人物和概念占了绝大多数,而佛家甚少,道家付之阙如。在这本《中国哲学百科全书》里,儒家细到立“汉儒学”、“唐儒学”、“宋儒学”、“明儒学”和“清儒学”等词条,佛学则仅有“佛学”和“禅宗”两个词条,许多重要问题、人物,如“沙门不敬王者”、渐悟、顿悟、道生、慧远等都只是在这两个词条中点到而已。相比而言,《哲学卷》中佛、道的词条和内容还略多一些。《亚洲哲学百科全书》中对儒释道研究的比例略微平衡一些。应该指出,《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于中国哲学和精神文化多有发明,恰如皓壁晷曜,些许微瑕不足以掩其光泽。

参考文献:

- [1]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Edited by Antonio S. Cu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 [2]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sian Philosophy. Edited by Brian Carr and Indira Mahalinga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491.
 - [3]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Редакторы М. Титаренко, А. Кобзев, А. Лукьян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6.
 - [4] 贾泽林. 20世纪与俄苏哲学[J]. 国外社会科学, 1999(4).
 - [5] 敦尼克, 约夫楚克等主编. 哲学史(第一卷上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2: 1-2.
 - [6]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торое издание,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БСЭ» т. 21, 1953г. с. 269.
 - [7] Ян Хиншун. Материал из Википедии — свободн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EB/OL]. http://ru.wikipedia.org/wiki/%DF%ED_%D5%E8%ED%F8%F3%ED.
 - [8] В. Алексеев.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Москв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1982, с. 213.
 - [9] В. Алексеев.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Москв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1982, с. 302.
-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12&ZD170)、教育部重点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俗文化在东北亚的传播研究”(10JJDZONGHE011)、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项目“近二十年俄罗斯的中国观研究”(SKG101004)资助。

作者简介: 刘亚丁(1959—),男,四川荣县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汉学研究。

责任编辑: 董积生; 校对: 亚中